

日、韩、印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及给中国的启示

杨 舸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32)

【摘要】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正在受到关注。日本、韩国、印度也经历了相似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日本、韩国正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甚至人口负增长所困扰,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效果不佳;而印度则不得不应对人口过多所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中国正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受到严重挑战。依据日本、韩国、印度的人口政策经验,我国应尽快启动人口政策调整机制,把握时机,为人口问题未雨绸缪。

【关键词】 人口结构; 变动趋势; 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3) 04-0147-07

近年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及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引发广泛的讨论。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在不久将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这一结构变动将带来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不但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高级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局面仍将持续,普通劳动力也将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社会保障体制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给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和国民财富积累的时间不多,庞大的老年人口将会给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这样的人口转变过程曾发生、正发生或将发生在日本、韩国、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亚洲国家。在小农经济向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以上四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受到“人口红利”的推动,人口转变的发展过程也存在诸多相似的特征。

一、四国的人口转变历程比较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在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下,人口再生产类型会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比较中国、日本、

韩国和印度的人口转变过程,日本走在最前面,接着是韩国和中国,最后是印度。

从生育水平的角度来说(见图1)。日本在1950年时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就已经下降到3,远低于同时期的中韩印(TFR为5-6左右);日本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1975年左右便下降到了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以下,韩国的这一变化发生在1985年左右,中国发生在1990年左右,印度妇女的TFR直到现在仍然保持在2.7以上;目前,中国、日本、韩国均到达低生育水平阶段,TFR低于1.8,其中日本低于1.3。

从死亡水平来看(见图2)。人口预期寿命是反映人口总体健康、死亡水平的综合指标。早在1950年,日本的人口出生预期寿命就超过60岁,远长于同时期的中韩印,1965年超过70岁,1990年超过80岁;中国和韩国的人口出生预期寿命变化趋势比较接近,在1970年左右超过60岁,韩国在1990年前后超过70岁,中国在1995年前后超过70岁;印度的人口寿命一直比较短,直到目前,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仅为65岁左右。

【收稿日期】 2013-01-25

【作者简介】 杨舸(1984-),女,江西九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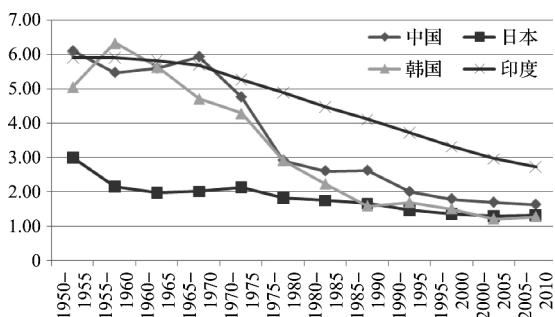


图1 中日韩印四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 (TFR)

数据来源: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 (2010 版)《世界人口前景》, 以下图表如无特别说明, 均同此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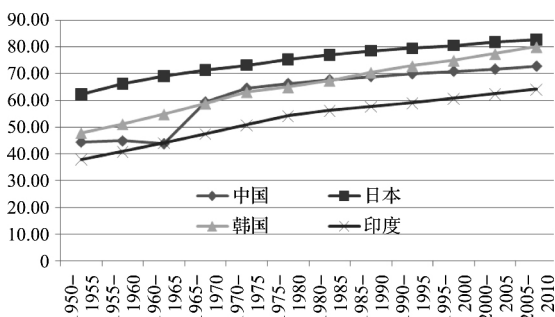


图2 中日韩印四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 (岁)

从人口结构变动来看。由于日本最先发生人口转变, 其人口抚养比下降最快 (见图3), 早在1965年左右, 日本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到了50以下。这样较低的人口抚养比持续了30多年, 极大推动了日本的经济起飞, 但也很快迎来了人口老龄化, 日本的老化系数 (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在1985年就超过了10% (见图4), 进入老龄社会; 韩国的人口抚养比下降略早于中国, 在1990年左右下降到50以下, 并将持续到2025年左右结束, 中国的这一过程将比韩国推迟10年左右; 中韩的老龄化水平同样如此, 韩国的人口老化系数在2005年左右超过10%, 中国的这一过程也将比韩国推迟10年左右; 印度的较高生育水平和较高死亡水平, 决定了印度的人口结构还很年轻, 2010年印度的老化系数仅为5.55%, 如果印度持续维持目前的生育水平, 印度的人口抚养比将不能下降到50以下。

二、人口发展带来社会经济后果的两面性

尽管目前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

未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或地区更加发达, 但人口转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 其具有两面性。人口既是消费者, 也是生产者, 人口转变通过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和宏观经济相互影响。一方面, 伴随人口转变的人口抚养比下降过程中的“人口红利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 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 社会总体的生产能力增强, 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储备能力增强; 另一方面, 人口抚养比在整个人口转变过程是呈现U型发展趋势的, “人口红利期”过后, 紧接着而来的是人口抚养比上升, 劳动力供给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加剧, 这可能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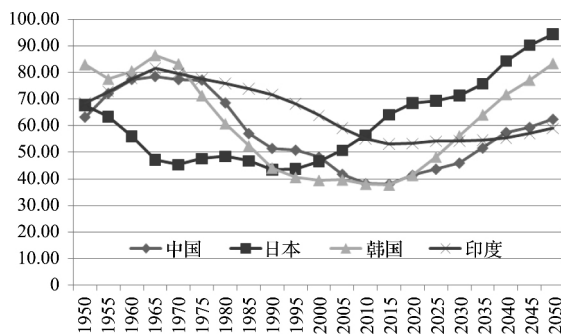


图3 1950 - 2050年中日韩印人口抚养比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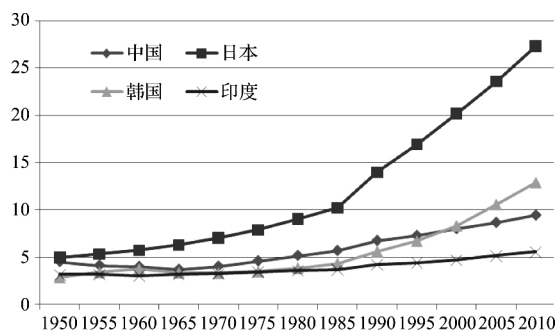


图4 中日韩印四国的老龄化系数 (65岁及以上人口占百分比, %)

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常常被学者认为是人口转变促进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日本经济起飞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 与其人口转变相吻合。1913 - 1950年, 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 1950 - 1973年, 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直至1973年石油危机后, 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 (Maddison,

2001)。日本人口抚养比呈现与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最快,也是日本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的阶段。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的较低水平,日本的经济也持续保持平均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随着人口老龄化,日本的抚养比呈现上升趋势,日本经济也开始持续萎靡不振。一些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及其养老体制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增长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Hewitt, 2003)。

韩国的发展经验也印证了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高度关联性。1960年以后,韩国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总抚养比从1965年的86.5%下降到2009年的37.9%。在1970-2000年的30多年时间里,韩国实现了年均6-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上世纪70、80年代,韩国的GDP年均增长将近10%。

东亚经济奇迹得益于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的持续,而这恰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适龄劳动人口迅速增加。在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双重推动下,东亚储蓄率和投资率自1970年的20%持续上升,上世纪90年代初储蓄率达到32%左右,投资率更是高达36%。美国经济学家莫迪里亚尼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认为一个人在退休前总是倾向积极储蓄以准备退休后使用,而退休后则基本上停止储蓄,开始使用自己的储蓄。所以,日本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储蓄率和投资率不断下降,由上个世纪70年代的40%左右降至2009年的20%。

中国国内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现象也得益于“人口红利”。他们将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劳动投入增加、资本投入增加和反映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及未能解释部分的综合要素,即生产率(TFP)增长三部分。李坤望对1982-1990年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研究表明,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8%。^[2]蔡昉、王德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3]武剑(1999)的研究中观察到,在1979-1998年的20年间,劳动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一直是显著和积极的,但却呈

现逐步减弱的趋势。^[4]

但人口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是一次性的,生育率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造成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下降,劳动力参与率也大幅下降。这使得劳动力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兴经济体必须迅速找到新的支撑经济增长的方式。另一方面,年龄偏高的熟练劳动力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降低潜在劳动生产率。

第二,整体市场需求将萎缩。15-64岁的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年龄人口,即消费最旺盛的人口。整体消费市场可能由于“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的减少而趋于萎缩。尽管会有为满足老龄人口的需要而新开拓的市场,依然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品市场的萎缩。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和家庭负担加重。老年人比重增加将会加重社会负担。养老金很大程度上依靠税收和劳动力退休金积累,为了给庞大的老年人口支付养老金,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从而加重国民负担。这有可能抑制个人消费,减少投资,进而使经济增长减缓。对于家庭来说,现代社会家庭规模缩小,人口老龄化使得健康照料需求和费用急剧上升,未来家庭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三、日、韩、印的人口政策与人口问题

日本、韩国和印度处于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作为新兴经济体,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具有相似性,各国在现阶段均面临相似又不同的人口问题。由于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面性,在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对待人口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是不同的。

1. 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之一,经历快速人口转变的日本被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困扰。

日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限制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的国家。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试图降低生育水平,政府成立了优生保护咨询所。^[5]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改善,妇女的高学历化和高劳动参与率,又使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上升。此外,教育费用负担与住宅条件等因素也促使“少而精”的生育观日益普及。生育率下降是日本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从图1可知,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的数据,1950-1955年,日本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3.0,远低于当时的中韩印,到1975年,日本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2.0以下,低于更替水平,目前日本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左右。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人口为8000多万人,到1967年就超过一亿人,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人口增速趋缓,总人口大体维持在1.2亿人的规模。2005年,日本总人口第一次出现下降趋势,为1.28亿人,2008年其总人口进一步降至1.2771亿人。日本人口开始了“负增长”时代。根据预测,如果日本妇女的生育率仍然保持现在的生育水平,那么到2050年,日本人口总量将下降到1亿,比现在减少2000多万。

由于人口寿命的延长和生育水平的下降,日本人口快速老龄化。从图4可以知道,1950年日本人口老化系数为5%,2010年已经高达27%,意味着每4个人中就有不止1个老人。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将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正在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减少。如图3所示,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1990年下降到43之后便持续上升,到2020年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将超过68,到2065年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将超过100,意味着每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一个儿童或老人。人口减少有可能导致国民经济规模缩减,致使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日本在199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重要关系。

为此,日本政府重新修订了持续多年的人口政策,转而实施奖励生育的措施。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

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5]但是试图提高生育水平的鼓励生育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2. 韩国

韩国的人口转变比中国早十年左右。在人口红利期实现了经济起飞,现在却因过低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快速老龄化而大伤脑筋。

在1950年代,韩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高达5-6,人口快速增长与粮食、自然资源供给矛盾突出。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29‰。为此,韩国在1960年代初开始提倡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1964年之后韩国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通过各种途径推广和鼓励人们采用避孕方法。收入水平提高和家庭计划政策实施,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到1985年前后,韩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以下,现在仅为1.32。人口转变使得总抚养比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1995年的41.4,从而开启了韩国获得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韩国利用人口红利的机遇期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

但是,随着生育率的逐步下降,韩国政府于1996年废除了长达36年的控制人口的政策,并制定了《低出生高龄社会基本法》,开始鼓励国民生育。例如,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给予产妇90天带薪假期,并给予男性3天的“生育假”;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至50万韩元(1美元约合1163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等。^[5]可情况并未发生根本好转,总和生育率于2005年下降至1.08,许多人担心日趋老龄化的韩国将来会失去成长的动力。于是,韩国政府开始鼓励多生孩子。可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仅升至1.22。由于低生育率和由此加剧的老龄化,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快速减少,“人口红利”时期将于2016年结束。根据韩国中央银行预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在2030年至2050年期间,韩国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至2005年间的约5%下降

至约 2%。

同时，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重社会负担。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0 韩国社会指标》显示，1980 年韩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3.8%，2010 年该比例升至 11%。老龄化带来了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大幅增长。2009 年韩国 65 岁以上老人的医疗保险费用占总医疗保险费用的比例首次突破 30%，而 1999 年这一比例仅为 17.0%，10 年间增长了 13.5%。^[6] 国民退休金、健康保险、基本老龄退休金、长期疗养保险和健康保险等老年人相关支出将让韩国财政不堪重负。

3. 印度

印度人口总量大，年龄结构轻，增长速度快，资源环境压力大。

1950 年，印度人口为 3.6 亿。在 1951 - 1991 年的 40 年间，印度人口从 3.61 亿增长到 8.44 亿，绝对增量达 4.83 亿，年均增长率高达 2.15%。尤其是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年均增长率更高，分别为 2.24% 和 2.26%。印度是第一个将人口控制作为国家计划主要内容的发展中国家。早在 1951 - 1956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印度政府就已提出了“节制生育”的理念；6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已开始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到 70 年代，由中央统一严密管理计划生育工作。这种没有缓冲带的高压政策不仅与文化、习俗、宗教等碰撞，而且引起了政治骚乱，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甚微且被迫中断。^[5] 到 80 年代，印度政府重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没有女性保障、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等配套政策，该项人口政策并不成功。1981 - 1991 年，印度人口的绝对增量为 1.61 亿，1991 - 2001 年，印度人口增长 1.8 亿，增长规模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根据印度的人口结构和生育水平判断，印度人口还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2000 年印度政府颁布了《国家人口政策 2000》，政策重点是转变生育观、完善各项配套政策。

比较印度和中国的妇女生育水平，在 1970 年之前，中国和印度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比较接近，在 5 - 6 之间。随着中国计划生育的实施，生育率不断下降，到 2000 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8。印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虽然也

一直在下降，但在 2000 年依然保持在 3 以上。如图 1 所示，2005 - 2010 年，印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2.73，远高于中国。据美国普查局估计，到 2025 年，印度总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即将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对于印度并不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一方面，印度将迎来较长时间的低人口抚养比时期（见图 3），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人口增长刺激消费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巨大的人口规模带来的潜在市场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机会。但是，要把“人口红利”转化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还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印度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比较低，不利于劳动力转变为生产力。印度的基础建设和城市建设还较为落后，阻碍了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印度还需要面对庞大人口对资源的巨大需求，经济发展必须为大量青年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否则，小则影响社会安定，大则影响国家兴亡。印度人口的迅速增长阻碍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印度的历次五年计划期间，无论国民收入怎样增长都被急剧增长的人口所吃掉；人口的迅速增长阻碍着人均食物供给量的增长，粮食产量的增长并没能给国民带来足够的食物；迅速的人口增长降低了人均土地占有率，阻碍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越来越少；迅速增长的人口给教育、卫生保健和住房带来极大的压力，公共卫生和保健设施、住房等都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纵观这三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口问题，日本和韩国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伴随着这两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很快。印度的人口控制政策并不成功，这与印度国内种族、宗教方面的复杂局势有关。近年印度的生育水平下降较快，但主要归功于经济发展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不是人口政策。然而，日本、韩国鼓励生育的政策却都不见成效。这使得许多学者开始担心，一旦极低生育率出现，生育观念的转变将无法扭转，人口政策的调整必须把握时机。

四、中国的人口趋势和问题

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并对生育率下降发挥了重大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从 1992 年开始生育水平在 1.8 左右上下波动，目前，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到了 1.4 - 1.5 左右。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中国人口负担迅速下降，儿童比例下降，老年比例提升。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人口结构类型由成年型进入老年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由 1990 年的 66.7%，增长到 2010 年 74.5% 左右，上升了 8 个百分点。由于有效的计划生育控制，少儿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从 1990 年到 2010 年，0 - 14 岁少儿人口比重由 27.7% 下降到 16.6% 左右。相应地，少儿抚养比由 41.5 下降到 22.3 左右。与此同时，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则由 1990 年的 5.6% 上升为 2010 年的 11.9%。人口总抚养比由 1990 年的 49.8 下降到 34.2。

假定维持目前较低生育水平不变（见图 5），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下降，从 2010 年的最高值 71.4% 下降到 2020 年的 69.4%，2040 年，这一比例将下降到 60% 以下；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从 2010 年的 9.42% 上升到 2020 年的 13.53%，2050 年将超过 30%；同时，人口总抚养比将由目前最好时期的低于 40，上升到 2050 年的 62.4。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目前，中国处于最好的阶段，但之后的各项指标将朝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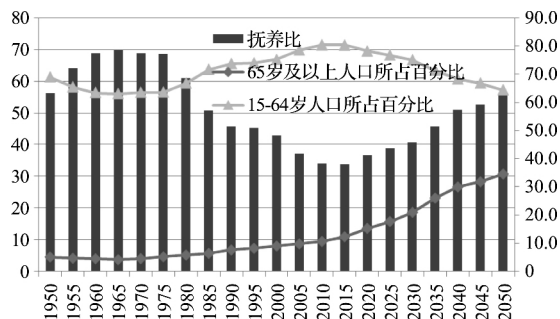


图 5 1950 - 2050 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常数方案）^[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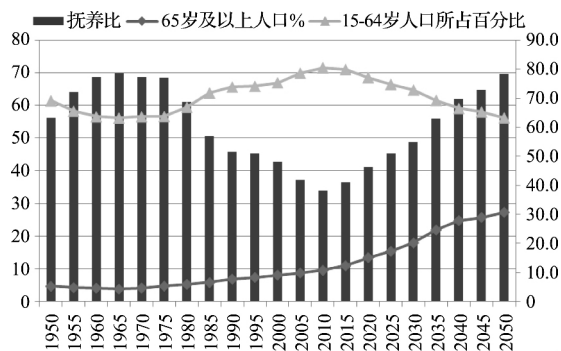


图 6 1950 - 2050 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高方案）^[7]

中国经济将面临劳动力供给的困扰。中国的人口增长放缓，来自农村的劳动力逐渐萎缩，长期来看将推高工资和劳动价格，中国需要更多的收入分配，以确保消费可以支撑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步伐将放缓，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为消费。在老龄化之前，中国应增强技术产业，提高本国产业在生产链条上的位置，但这一过程十分紧迫，必须赶在人口老化之前完成产业调整。在这方面，印度有比中国更有利的条件。国外专家指出，尽管印度在利用劳动力方面还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印度人口的抚养比持续改善，将可能影响两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前景。

老龄化使得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面临最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将预示着劳动力市场的萎缩，经济学家预计中国将面临更高的工资增长压力，中国政府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保险、养老金和医疗方面。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口老年化速度更快，以至于留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的斡旋时间已非常短促。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五、讨论和总结

日本、韩国、印度的人口问题给中国解决人口问题一定的启示。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我国生育水平一定程度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事实上，人口结构的调整变化是非常缓慢的过程，是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生育和死亡状况的综合后果。即便现在开始调整生育政策，2020 年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恢复到 2 左右（见图 6），劳动力供给和老龄化的趋势也

无法发生根本性转变，还会提高未来一段时期的人口抚养比，但从长期来看可以缓解 50 年后人口老化和萎缩状况。

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抑制生育的政策在降低生育水平上都能够发挥作用，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非常有限。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生产从以家庭为单位转变为以个人为单位，同时养老方式也从以家庭养老为主转向以社会养老为主。所以，抑制生育政策的施

行是顺应社会、经济、文化转变的。但生育率降下来之后，再施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是逆行的，这也正是现在世界上的低生育水平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却难以提升其生育水平的所在。

由于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人口发展趋势，切莫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注释：

- [1] 2015 - 2050 年数据为联合国预测数，选取假定按照目前生育水平不变的情况预测的方案。
- [2] 李坤望.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比较分析 [J]. 中州学刊, 1996 (01).
- [3] 蔡昉, 王德文.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 [J]. 经济研究, 1999 (10).
- [4] 武剑. 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 [J]. 经济研究, 1999 (11).
- [5] 孙树菡, 余飞跃. 韩印日三国人口政策历程及启示 [J]. 人民论坛, 2006 (08).
- [6] 韩国人口老龄化加速 (EB/OL). 新华网 - 新华国际, 2011 - 03 - 07.
- [7] 2015 - 2050 年数据为联合国预测数，选取假定总和生育率在 2020 左右逐步恢复到 2 左右的预测方案。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Trends and Consequences of Japan , South Korea , and Indian-Revelation to China

YANG G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732 ,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facing changes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labor relations , and aging population ,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seriously challenged.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policy experience of Japan , Korea , India , China should star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djust the population policy ,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plan ahead for the population problem.

Keywords: population structure; tre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